

三十卷本《商文毅公全集》诗文重出与校者辨伪考

宋佳霖

内容摘要:作为在明季首次以“全集”面貌问世的商辂集,三十卷本《商文毅公全集》看似较之已有的十一卷本和十卷本增容甚夥,但实际在新补录的约 500 首诗、100 篇文中,近七成均系他人之作。诗作的重出主要集中于《古今诗删》及高启、骆问礼、许相卿、俞安期、谢榛、张居正、梅守箕等作家别集;文章的重出在窜易别集作品之余,还挪用了通行类书中的翰墨示例。三十卷本删减了诗文中涉及原作者身份经历及所处时代的副文本信息,篇名的改动反映了编纂成书时更为具体的作伪细节及由此带来的诸多纰漏,作品重出实属编者刻意造伪。卷端署韩敬、茅维、臧懋循为文集校者亦不足信,更可能是书商妄托商辂三元及第的科考宿望,并藉三人梓集之盛名,以滥充珍,冀图射利。

关键词:《商文毅公全集》 三十卷本 诗文重出 校者辨伪

在明代中后期的书籍生产中,窜乱旧本、贋作古书的作伪行径时有发生。但在固有的文学史观念下,将数人作品刻意打散糅入一人集中进行造伪,这种伪书的成书方式却非常有。然而,明季出现的三十卷本《商文毅公全集》却为此类罕见的作伪手段提供了难得的范例。商辂(1414-1486),字弘载,号素庵,浙江淳安人,正统中乡试、会试、殿试三元及第,累官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卒谥文毅,《明史》有传。在现存可见的诸版本商辂集中,仅三十卷本冠以“全集”之名。但作为商辂谢世近百五十年之后方才面世的一部文集,所收作品是否确为商辂所作,“全集”之称是否名实相符,却是值得审视的问题。

本文以三十卷本《商文毅公全集》中新补录的约 500 首诗、100 篇文为考察对象,钩稽其中重出他作的详细情况,通过文本比对与校者考辨,揭橥三十卷本系书商托名校刻、故意造伪的真实面貌,以期校讹正误、汰伪存真,俾便对商辂研究作出更具准确意义的观照,同时亦为晚明刻书业中编刊质量

良莠不齐、作伪手段参差复杂的出版面相提供更具典型意义的例证。

一、商辂集版本系统概述

现存最早的《商文毅公集》为隆庆六年(1572)郑应龄所刻十一卷本,前有徐楚所撰集序,后有商辂裔孙诸人所撰后记。据集序及后记,在是集刊刻前,商辂的遗稿业已残毁,“亡虑数千,值兵燹,存者十一二”,“仅存《奏疏》《遗行》诸刻”^①。是集为郑应龄莅任淳安时,博求散佚诗文汇而付梓。商辂卒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十一卷本的上梓距其谢世已近百年。在此期间,商辂后人曾辑其佚作,但谋刻未果。郑应龄所刻十一卷本《商文毅公集》,应是当时明人所能看到的最全、最早的刻本。

其后所出的十卷本《商文毅公集》由刘体元编刻于万历三十年(1602),前有金学曾序、刘体元自序,后有吴一桢后序。据集序所言,在郑应龄刊毕商辂集后,“岁月浸久,板亦就敝”,十一卷本亦遭残毁。是集为刘体元宰淳安时,“与公之孝廉孙之彝同文箴,称莫逆交”,故而得以“旁搜家藏”,重付剞劂^②。就存录的诗作而言,除1首五古仅见于十一卷本《商文毅公集》外,十卷本涵盖了十一卷本内的其余所有诗作,多出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七律,体裁上则未有增补。存录的文章中除去新增的2篇墓志,十卷本所收奏疏、序文等数量较之十一卷本皆有不及。

清代出现的六卷本《商文毅公集》由张一魁梓行于顺治十五年(1658),民国八年(1919)时知淳安县事的王家琦将之重付梨枣。是集前有张一魁、刘健、谢鼎元所撰集序,后有虞世恺所书后序。据商辂七世孙商德协的跋语,在明清易代之际,商氏家藏的商辂集刻板“一毁寇手”,迨至舒长假日冀图复梓时,“所辑前稿已不尽存”^③。是集为商德协购求简次汇辑而成,故所录诗文存数虽少,但多为十一卷本、十卷本所未见。

在上述十一卷本、十卷本及晚出的六卷本中,商辂后嗣或是协助搜集残篇,或是参与校订卷目,或是题写文集序跋,都直接介入了文集的编纂工作,结集的过程与作品的来源也都交待得较为清晰。在这三个版本的商辂集中,存诗数量都不算多,且仅在集中占据一卷的篇幅。相较而言,下面将要论及的三十卷本《商文毅公全集》,无论是所收诗文的数量体裁,还是文集编

①商辂:《商文毅公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71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476、340页。

②商辂:《商文毅公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710册,第477、479、613页。

③商辂:《商文毅公集》,《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43册,黄山书社,2013年,第78页。

纂的细节样貌,都呈现出尤为突兀的面相(见表1、表2):

表1 各版本商辂集不同体裁诗作数目概览

(题/首)	五古	七古	四古	五律	五排	七律	七排	五绝	七绝	乐府	赋	词
十一卷本	6/6	14/26	0	2/2	2/2	24/26	0	0	11/19	0	0	0
十卷本	6/6	14/26	0	3/3	3/3	70/75	0	0	13/22	0	0	0
三十卷本	29/44	43/58	0	99/106	24/24	131/141	8/8	75/85	97/123	9/12	8/8	11/14
六卷本	4/4	2/4	1/6	1/1	1/1	13/13	0	0	6/10	0	0	0

表2 各版本商辂集不同文体文章数目概览

(篇)	表	奏疏	启	书简	经筵讲章	策	程文	论	序	记	祭文	碑志墓表	行状传	杂著 ¹			杂著 ²
														跋	赞	铭	
十一卷本	1	24	0	0	7	0	0	0	47	18	0	20	3	1	1	0	5
十卷本	1	18	0	0	7	0	0	0	40	17	0	21	3	0	1	0	3
三十卷本	1	19	21	35	7	1	0	0	40	16	12	14	6	5	8	4	16
六卷本	0	7	0	0	0	3	3	1	33	15	0	11	0	0	0	0	0

三十卷本《商文毅公全集》为晚明刻本,首卷卷端下题“西吴韩敬求仲甫校”,其后各卷卷端题“后学汉阳刘体元编辑”,并附各卷校者信息^①。是集收有金学曾及刘体元所撰序文,与十卷本集前序并无二致。但在所收诗文的数量上,三十卷本却增容甚夥。诗作在其中占据了十三卷的篇幅,不仅在已有的体裁范围内补录尤多,且所收七排、五绝、乐府、赋、词等诸体也为其余各本所未见。文章则主要新增启、书简和祭文,并对原有的文体分类略作调整。

今人点校本《商辂集》对商辂诗文的选录以十卷本为底本,辅以十一卷本、六卷本和三十卷本为补充。尽管整理者对三十卷本的编纂疏漏有所察觉,指出其内容虽全却难称善本,所录诗文存在有目无文、内容阙略、误收他作、错字错简之失^②,但在实际编校的过程中,三十卷本的新增诗文几乎均被收录,仅有重出的高启诗10首、许相卿诗2首、苏轼词9首被剔除。对三十卷本诗文的重出情况,点校本尚未付以整体的观照并进行考辨;对三十卷本全集的真伪性问题,学界亦未提出质疑。在商辂谢世近百五十年之际,在其

①商辂:《商文毅公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刻孤本秘笈丛刊》第1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三十卷本的版式行款信息在是集前的编者按语中已有介绍,兹不赘述。

②商辂著,孙福轩编校:《商辂集》点校说明,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8页。

遗稿及板刻已历经残毁、籍里和家族已遍寻散篇的前提背景下,于明季突然冒出的这部三十卷本商辂集,在尽收十卷本存作之余,又多出近 500 首诗、100 篇文,且有诸多体裁为前本所未见;卷端书“韩敬甫校”“刘体元编辑”,但无任何新附集序可对结集过程加以说明;自题“全集”之名,却编纂不精、粗率而成,集中多亥豕鲁鱼之谬。此中种种难以解释的现象,难免令人滋生疑窦。对于三十卷本《商文毅公全集》诗文重出与校者辨伪的考察,亦藉此发覆。

二、三十卷本商辂集诗作重出考

三十卷本存赋共 8 篇,其中 6 篇见于他人别集。《午夜读书赋》《思亲赋》2 篇重出丘兆麟集,题为《夜读赋》《思母赋》^①。《午夜读书赋》序中称“故善读者,日不足每继之以夜焉,作《夜读赋》”,应是三十卷本篡改了原有赋题,却遗漏了对序中文字的改动。《思亲赋》序中称“愧余呱呱,少遭凶阨,先大人弃儿弗怙”,商辂之父商瑭卒于正统三年(1438)^②,时商辂 25 岁;而丘兆麟之父谢世时,丘兆麟年仅 6 岁^③,与序文所述相吻合。可知此赋本作《思母赋》,为商辂集中作伪。《萝荫堂赋》《哀逝水赋》2 篇重出许相卿集^④,前者题作《萝补堂赋》,并附有小序,称“萝补堂者,从吾董翁所自名其居也,祈余赋之”。从吾董翁,即董澐,晚年改号从吾道人,许相卿集中有其墓志。商辂集在改动此篇赋题的同时删去了小序,掩盖了与作赋者相关人物的身份信息。《江云赋》《杏花赋》2 篇重出刘凤集^⑤,前者题作《江上之云赋》。在刘凤集中,所收赋文按照题材分为“时序”“登览”“居处”“志”“感谕”“情”“物色”等主题,《江上之云赋》从属“时序”。剩馀 2 篇赋文的作者虽不明确,但亦应为伪作。《为西溪先生赋》中,有“志允适于优游,年忽臻于耄耋,百千万兮遐享,七十八焉坐阅”之句。西溪先生即鲍恂,徙居嘉兴西溪,有《西溪漫稿》行世,学者尊之曰“西溪先生”。据《本朝分省人物考》,洪武初鲍恂被召

①丘兆麟:《学馥园初集》卷一,《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 882 册,第 14-15 页。

②商振伦编:《明三元太傅商文毅公年谱》卷一“正统三年戊午二月”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83 册,齐鲁书社,1996 年,第 100 页。

③《故少司马大中丞毛伯丘公墓志铭》:“公生六岁,而赠公下世。节孝于翁代为子,于公代为父。”(陈际泰:《已吾集》卷七,《明别集丛刊》第四辑第 93 册,第 474 页)

④许相卿:《云村先生文集》卷一,《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 752 册,第 1、3 页。

⑤刘凤:《刘子威集》卷二、卷四三,《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 99 册,第 41、559 页。

至京时已“年八十馀”^①，此赋当作于其 78 岁之际。商辂生于永乐十二年（1414），断然不会是其作者。《瑞雪赋》虽在《明文海》中亦署为商辂，但考虑到《明文海》将《午夜读书赋》系名于商辂而非丘兆麟，则《瑞雪赋》作者的可信度也就大为存疑。

三十卷本所收 12 首乐府，均重出他人文集。《独漉篇》本为何景明作^②。《驾六龙行》《相逢行》《白纻辞》3 首见于俞安期集^③。在是集中，《驾六龙行》《相逢行》并属同组纪事乐府，每题纪一事，共 11 题，题下均附小识，《驾六龙行》为“纪南巡也”，《相逢行》为“纪谗友也”。《白纻辞》下亦有小识，题“席上观舞作”。《步出帝城门》《哀少妇》《乌栖曲》《乌夜啼》《思归引》共 5 题 8 首乐府，则见于两个版本的谢榛集，分属绝句或古体^④。

三十卷本所收 14 首词，均非商辂所作。其中，《沁园春》《一丛花》《鹧鸪天》《少年游》《望江南》《雨中花慢》《祝英台近》《桃源忆故人》《调笑令》9 首均为苏轼词，诸词皆词调在前^⑤。《花朝咏》（调《满庭芳》）的编录体例与之不同，词题在前，词调以小字注于题后。此词应为骆问礼所作^⑥，词中有“放

①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四，《续修四库全书》第 53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68 页。

②何景明：《何氏集》卷五，《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 16 册，第 367 页。

③俞安期：《蓼蓼集》卷四，《明别集丛刊》第四辑第 30 册，第 45、46、47 页。

④《步出帝城门》仅见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刻二卷本《谢茂秦集》。《乌夜啼》仅见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赵府冰玉堂刻《四溟山人全集》，题作《乌夜啼送毕比部廷鸣奔丧》。《哀少妇》在《四溟山人全集》中有近三分之一文本出现异文，二卷本中则文字相同。《乌栖曲》在二卷本中仅存 2 首，文本无异文；在《四溟山人全集》中存 4 首，其中 2 首近半文本有异文。《思归引》仅见于《四溟山人全集》，自第 12 句后文本全异。详参谢榛：《谢茂秦集》，《明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 95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 年，第 325-326、373-374、328 页；谢榛：《四溟山人全集》，《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 45 册，第 250、62、264、87 页。

⑤今存商辂词多为苏轼词，前辈学人已有论及，详参张仲谋：《〈全明词〉采录作品考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3 期，第 115-116 页。在重出的 9 首苏轼词中，除《祝英台近》之外的 8 首均已见于南宋傅幹《注坡词》及元刻本《东坡乐府》。但通过比对词题及小识可知，三十卷本所据底本应为明茅维所刻《东坡先生全集》（苏轼撰，王宗稷编：《东坡先生全集》，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吴兴茅维刻本，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卷七四，叶九、十、十八、十九、三十一；卷七五，叶二十二、二十五至二十六、四十三）。

⑥骆问礼：《万一楼集》卷四，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骆先行、骆中行刻本，浙江省图书馆藏，叶三至四。

衙人乍散,琴抛案牍,酒载郊垌”和“十载邯郸古道”句。邯郸道,谓功名仕途。正统十年(1445),商辂进士及第,十年后为景泰六年(1455),时商辂在京任翰林学士,不当云“放衙”,故知此词并非商辂所作。剩下一组《四时宫词》共4首,每首6句,每句7字,诸词调中仅《浣溪沙》属此格,但其声律显然并不叶韵。这4首诗重出谢榛集,本属七古,题为《宫词题画》^①。三十卷本将其归类为词,明显有误。

至此,三十卷本中新增的赋、乐府、词三种体裁下的作品均已证伪。通过比对商辂集与重出的他人文集(详见下表3),不难发现,三十卷本在编纂过程中删改了原有文本中的部分细节,遮蔽了其间可能呈现的与原作者身份、经历或所处时代相关的信息。反言之,对于归属在不同作家名下的同一文本,标明作品所纪之事的题识、提及具体人物事件的小序、划分作品题材类型的卷目词等副文本样态越详赡,文本的真实性和作者署名的可信度自然就越高。不难想见,在作品造伪时,相较于通过“做加法”去增添新的文本内涵进而寻求作品内部的再一次自洽,通过“做减法”来模糊文本原有的话语表达总是要更为易行,此自不待言。

表3 三十卷本《商文毅公全集》不同体裁诗作重出情况

(题/首)	三十卷本所收 诗作总数	三十卷本新增 诗作数	三十卷本新增诗中 重出诗作数	重出作家及重出 作品数	
卷一 赋	8/8	8/8	6/6	许相卿	2/2
				刘凤	2/2
				丘兆麟	2/2
卷二 乐府	9/12	9/12	9/12	谢榛	5/8
				俞安期	3/3
				何景明	1/1
卷三 五古	29/44	22/37	13/24	《古今诗删》	4/4
				骆问礼	3/6
				梅守箕	5/13
				梅鼎祚	1/1

①二卷本《谢茂秦集》中仅存前2首,与三十卷本文字相同;《四溟山人全集》存4首,依次识“春夏秋冬”,后3首与三十卷本存在异文。详参谢榛:《谢茂秦集》,第327-328页;谢榛《四溟山人全集》,第63页。

续表

(题/首)	三十卷本所收 诗作总数	三十卷本新增 诗作数	三十卷本新增诗作中 重出诗作数	重出作家及重出 作品数	
卷四、卷五 七古	43/58	29/32	14/14	《古今诗删》	4/4
				高启	9/9
				张居正	1/1
卷六 五律	99/106	96/103	64/66	《古今诗删》	15/15
				高启	23/23
				骆问礼	15/16
				许相卿	7/7
				张居正	2/3
				王廷陈	1/1
				其他	1/1
卷七、卷八 七律	131/141	61/66	44/48	《古今诗删》	7/8
				许相卿	15/16
				张居正	7/9
				骆问礼	4/4
				王世贞	2/2
				高启	1/1
				杨基	1/1
				其他	7/7
卷九 五排	24/24	22/22	18/18	《古今诗删》	3/3
				高启	6/6
				谢榛	4/4
				骆问礼	2/2
				俞安期	2/2
				许相卿	1/1
卷十 七排	8/8	8/8	3/3	谢榛	2/2
				丁鹤年	1/1

续表

(题/首)	三十卷本所收 诗作总数	三十卷本新增 诗作数	三十卷本新增诗作中 重出诗作数	重出作家及重出 作品数	
卷十一 五绝	75/85	75/85	59/67	《古今诗删》	18/18
				高启	13/13
				俞安期	12/13
				骆问礼	9/13
				谢榛	5/8
				薛蕙	1/1
				郑延	1/1
卷十二 七绝	97/123	83/100	58/62	《古今诗删》	23/25
				高启	19/19
				骆问礼	11/13
				郑延	3/3
				林景旸	2/2
卷十三 词	11/14	11/14	11/14	苏轼	9/9
				谢榛	1/4
				骆问礼	1/1

* 表中的“其他”为系名于吕复的1首五律,系名于刘斧、李勣、瞿景淳、袁宗道、余学夔、赵迪、王恽的7首七律。因其并未收录于作家本人别集,而是散见于方志或诗选;抑或存在系名于两位不同作家的情况,署名的真实度亦存疑,故表中仅示数目,未作详列。

由上表可知,三十卷本中古近体诗作的重出,集中于诗选《古今诗删》和高启、骆问礼、许相卿、俞安期、谢榛、张居正、梅守箕等主要作家。其中,不同体裁内对《古今诗删》的摘取呈现出片段式、连续性的特点。五古中自《三忠祠》至《黄金台》4首、七古中自《题王原博潇湘万竹图》至《画鱼》4首、五律中自《游仙诗》至《五老峰》15首、五排中自《赋玉壶冰》至《山雪》3首、七律中自《白雁》至《白燕》8首、五绝中自《懊农歌》至《咏李舍人种桃》18首、七绝中自《仙人词》至《朝陵歌》25首,分别见于《古今诗删》对应体裁所选明诗。尽管在编次上,三十卷本重出的诗作并未完全遵照《古今诗删》中的排列顺序,但经过异文比对后依然可以断定,这些重出的古近体诗是从《古今诗删》中直接挪用,而非出自所选作家的别集。三十卷本与《古今诗删》的异文,几乎均为音近或形近致讹,往往仅为个别字词相异;但三十卷本与所选作家别集中的文本,则出现整句或多句异文,乃至全诗体裁发生变更。以下仅胪举两例以证。

如《赋玉壶冰》一诗,三十卷本及《古今诗删》中均为五排,仅第6句中“沉”“澄”二字异文,属音近致讹:

云送千峰雨,风凝万壑冰。金茎先沆瀣,锦席失炎蒸。灵响琼璜解,仙膏水碧澄。清泠浮绿蚁,潇洒绝青蝇。凉草虚疑挂,寒菰定未胜。何当却尘鞅,赤脚踏高层。^①

但在杨慎集中,此诗出自下面这段诗话:

癸未之夏,余在馆阁与张太史惟信小饮,探题赋玉壶冰。余效唐省题诗,赋五言六韵云:“尼父休藏玉,壶公爱饮冰。金茎流沆瀣,锦席失炎蒸。灵响琼璜解,仙膏水碧凝。清冷浮绿蚁,潇洒绝青蝇。壑讶凌阴近,江疑净练澄。恍如玄圃上,赤脚踏层冰。”盖唐人省题诗似今之科场程文,如此题《玉壶冰》,首二句必以“玉壶冰”三字错综用之。惟信深许余此言,谓首二句射双鹄手也,遂书于扇,传咏于词林。^②

这段诗话解释了此诗题作《玉壶冰》的由来。显然,杨慎集中的“尼父休藏玉,壶公爱饮冰”方符合首二句以“玉壶冰”三字错综用之的省题诗要求。《古今诗删》对此诗的改动已失其本意^③,三十卷本则径直照搬,未详其原貌。

再如《薤露歌》一诗,三十卷本及《古今诗删》中均为五绝:

人生无百岁,百岁复如何。古来英雄士,俱已归山阿。^④

但在刘基集中,此诗本为乐府诗:

蜀琴且勿弹,齐竽且莫吹。四筵并寂听,听我薤露诗。昨日七尺躯,今日为死尸。亲戚空满堂,魂气安所之。金玉素所爱,弃捐篋笥中。佩服素所爱,凄凉挂悲风。妻妾素所爱,洒泪空房枕。宾客素所爱,分散各西东。雠者自相快,亲者自相悲。有耳不复闻,有目不复窥。譬彼烛上火,一灭无光辉。譬彼空中云,散去绝馀姿。人生无百岁,百岁复如何。谁能将两手,挽彼东逝波。古来英雄士,俱已归山阿。有酒且尽欢,听我薤露歌。^⑤

①李攀龙辑:《古今诗删》卷三一,《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52册,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350-351页。

②杨慎:《太史升庵文集》卷五六,《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30册,第464页。

③李攀龙在编选《古今诗删》时,曾对诗作原文加以改动。钱锺书称:“余所睹明清名选如李攀龙《诗删》……之类,胥奋笔无所顾忌。且往往一集之内,或注明删易,或又删易而不注明,其淆惑也滋甚。”(钱锺书:《管锥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61页)

④李攀龙辑:《古今诗删》卷三二,第357页。

⑤刘基:《诚意伯刘先生文集》卷六,《明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3册,第184-185页。

此诗对刘基原作进行截取,从诗作尾部抽出4句构成新的五绝。三十卷本直接挪用了《古今诗删》改动后的结果^①,其造伪所据的底本自然也非刘基本人的文集。

表4 三十卷本《商文毅公全集》古近体诗重出《古今诗删》及主要作家情况

(题/首)	《古今诗删》	高启	骆问礼	许相卿	俞安期	谢榛	张居正	梅守箕	合
重出数	74/77	71/71	44/54	23/24	14/15	11/14	10/13	5/13	计
百分比1	17.0%	15.7%	11.9%	5.3%	3.3%	3.1%	2.9%	2.9%	62%
百分比2	25.5%	23.5%	17.9%	7.9%	5.0%	4.6%	4.3%	4.3%	93%

* 此表仅列出三十卷本中重出古近体诗数≥10首的主要作家

百分比1:古近体诗重出数(首)/三十卷本新增的古近体诗作总数(453首)

百分比2:古近体诗重出数(首)/三十卷本新增古近体诗中重出诗作总数(302首)

三十卷本中重出的古近体诗作,另一主要来源为高启、骆问礼、许相卿、俞安期、谢榛、张居正、梅守箕等作家的别集(见表4)。其中,高启的卒年(1374)尚早于商辂的生年(1414),《高太史大全集》已于景泰年间刊刻,是时商辂尚未辞世,故重出高启集的诗作不证自伪。许相卿《云村先生文集》在嘉靖年间就已上梓,据其子许闻造所撰后识:“先君平生所著诗文甚富,晚岁去取而存之,重缮而藏去焉。先君既没之四年,闻造敬陈而览之……梓是集以永先君。”^②许相卿卒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其别集当于嘉靖四十年(1561)刊行,远在三十卷本出现之前,因此重出许相卿集的诗作亦应为伪。鉴于三十卷本内唯一可供系年的集序是曾在十卷本中出现的万历三十年(1602)刘体元序,其梓行的时间自然较此更晚;而其余几人的主要生平与别集付梓时间,又大抵均处于万历时期。职是之故,三十卷本重出其他作家别集的情况,仍需予以谨慎考辨方可作出定论。

梅守箕的卒年正值三十卷本集序所系的万历三十年(1602),但其诗作在生前业已汇编成集。据王世贞《梅季豹居诸集序》:“戊子(万历十六年,1588)冬,为有举宣城梅季豹者曰:‘是夫也,能不为近体人也。’已而季豹来谒。今年冬,则出一编所谓《居诸集》者见示,则皆骚赋、四五言古诗。”^③其别集的出现无疑早于三十卷本。三十卷本重出的5题13首五古,题目均与梅守箕集中原有诗题不同。其中,《送季侯先归》在梅守箕集中题为《送泰符侄先归》,泰符即梅

①钱锺书称赞李攀龙将刘基《薤露歌》转韵36句节删为4句,“淘剥肤存液,点铁成金,与原作如霄壤矣”(钱锺书:《管锥编》第3册,第363页)。

②许相卿:《云村先生文集》,第164页。

③梅守箕:《梅季豹居诸集》王世贞序,《明别集丛刊》第四辑第61册,第34页。

守箕集前《季豹居诸集评》的作者梅台祚^①。若系梅守箕集中作伪,身为集评者的梅台祚不应不有所察觉,据此可知是三十卷本中篡改了诗题。

骆问礼和俞安期的情况较为类似,二人生前均已有文集汇编成型,全集交由子孙校订付梓。据陈性学《万一楼集序》,骆问礼积二十余年咏著汇编成帙,命为《万一楼集》^②。是集在骆问礼谢世三年后,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由其子上梓。俞安期《蓼蓼集》的撰序时间尚付阙如,但集前汪道昆序中称“先是涉丹阳,藏都市,入楚蜀,赴豫章,悉发篋中,区别为集”,郭正域序中称“有前后游楚诗若干卷,合梓之”,吴国伦序中称俞安期曾“尽出其纪游诗二帙”,在请序后“授之剞劂”^③。可见俞安期曾按游历的地域自行结集,并在当时已有单行本别集问世。据集中《次答吴琼峰读余〈蓼蓼集〉见赠之作》一诗^④,可知俞安期生前已将《蓼蓼集》梓行并赠予友人,是集应为早期二十八卷本《蓼蓼集》,当成书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后不久;四十卷本全集《蓼蓼集》由其子孙共同编纂,刊刻时间晚至万历四十五年(1617)后^⑤。显然,骆问礼和俞安期二人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自己文集的早期结集过程,最终全集的上梓又均由后嗣合力完成,作品的真实性应是有所保障。尽管《万一楼集》和《蓼蓼集》的面世时间与三十卷本大致同期,但重出诗作当属三十卷本作伪。此亦可由重出诗作在不同集本中的样态加以佐证。例如,三十卷本中《灌菊》一诗,在骆问礼集中本与《得菊》《赏菊》《咏菊》并置^⑥,属同组五古;《桂坊》《松阁》二绝句,在《蓼蓼集》中本并属《孙光禄山居杂咏》,乃是据孙光禄的竹树居室一景一题,共录10题,“各题二十字,以效辋川之集”^⑦。三十卷本从组诗中抽取单篇诗作进行造伪,若将其还原至作家别集原有的文本样态下,自然真伪分明。

张居正的文集在其死后三十年方得以刊刻。据沈鲤万历四十年(1612)所撰《张太岳集序》,张居正遭祸后“稿多散逸无存,即存亦秘灭无传者。迨

①梅守箕:《梅季豹居诸集》甲乙卷二,第114页。

②浙江省图书馆藏《万一楼集》存前四十六卷,集前序阙。国家图书馆藏《万一楼集》仅存卷十一至卷五六、续集前二卷,但存朱赓、陈性学所撰序文。详参骆问礼:《万一楼集》陈序,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骆先行、骆中行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叶二。

③俞安期:《蓼蓼集》,第3、6、4页。

④俞安期:《蓼蓼集》卷二七,第251页。

⑤关于两个版本《蓼蓼集》的梓行时间,详参何朝晖:《山人与出版:俞安期生平、著述与刻书活动考》,《古典文献研究》第15辑,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381-383页。

⑥骆问礼:《万一楼集》卷十五,浙江省图书馆藏,叶十三至十四。

⑦俞安期:《蓼蓼集》卷三五,第332-333页。

今二十馀年,而厥嗣殿元君始蒐求遗业”^①,将其付梓。虽然在搜集先人散佚遗稿这一点上,张居正集与商辂集看似有着相近的编纂前期经过,但其子张嗣修在集前《凡例》中已有交待,是集的底稿来源是“逢难十馀年后始得完归”的“先公文集在旧记室所者”^②。相较于三十卷本,重出诗作系名于张居正应更足信。

至于重出谢榛集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一些。经版本核查及文本比对,三十卷本中仅见于二卷本《谢茂秦集》的诗作,文字往往并无出入;而同时见于或仅见于《四溟山人全集》的诗作,却存在明显的文本差异。除了前述8首乐府和4首言词中的异文,如五排《寄塞上王侍御》中“奇才逢圣代,雄略见儒生”二句,《四溟山人全集》中作“虚心当国事,高议见儒生”;结句“拟勒燕然石,铙歌入凤京”,《四溟山人全集》中作“应遣龙庭使,驰书到玉京”。而在二卷本中,此诗文字则完全相同^③。考虑到王世贞在二卷本集前序中称“茂秦故有集行于邺”,而二卷本又是王世贞在该集的基础上“去其十七”删减而成,据此推测,三十卷本所据的谢榛集底本,或许即是时期更早、存诗更全的“行于邺”的版本^④。

至此,三十卷本商辂集中诗作重出主要作家别集的情况均已明辨。基本能够判定,重出内容应系窃取他人之作^⑤。然而,尽管三十卷本新增诗作中已有近七成可以明确并非商辂所作,其作为商辂“全集”的价值定位已大打折扣,但也并不意味着是集在文献价值上无甚足观。三十卷本中诗作重出多人别集,建立在嘉靖至万历年间出版印刷业繁盛、文人文集广泛刊行流通的基础之上,直观地反映了编纂者在当时所能触及到的书籍文献。对于像谢榛早期“行于邺”这样的已佚文集,还是可以相信,粗率伪造成书的三十卷本应是比较忠实地维持了其中诗作内容的原貌。在保存并复原早期已佚文本的层面上,伪书可堪发挥的作用似乎应当予以更深微的考量。

三、三十卷本商辂集文章重出考

对商辂之文真伪的质疑其来有自,清代已有“就浙东西十一郡前辈言

①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3册,第326页。

②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诗文集》,第333页。

③谢榛:《四溟山人全集》卷十六,第231-232页;谢榛:《谢茂秦集》,第321-322页。

④谢榛:《谢茂秦集》,第303页。

⑤新增古近体诗作中,重出《古今诗删》与主要作家的数量占重出总数的93%。剩余7%的重出则为个别作家的零散作品,其参照来源可能出自当时的诗歌选本,而非作家别集。

之,世所传商文毅公文皆后人伪托”^①的论断。考虑到十一卷本、十卷本和六卷本集序所交代的编纂背景,如此俾众周知的说法很难说不是间接受到三十卷本的影响。较之十一卷本和十卷本,三十卷本新增启、书简、策、祭文四类文体,并在杂著类补入尤多。但在补录的约百篇作品中,逾七成均重出他作(见表5)。重出的主要作家仍集中于许相卿和骆问礼,此外,另有5篇启、5篇杂著各见于吴国伦《甌甌洞稿》^②和田艺蘅《留青日札》^③。二书的初刻时间分别为万历十二年(1584)和万历元年(1573),均早于三十卷本上梓,重出作品的归属自然不言而喻。

表5 三十卷本《商文毅公全集》不同文体文章重出情况

(篇)		卷十七	卷十八	卷二十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六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合计
		启	书简	策	序	跋	赞	铭	传	祭文	杂著	
三十卷本新增文章数		21	35	1	1	5	7	4	3	12	13	102
三十卷本新增文章中重出作品数		12	27	0	1	3	4	4	3	11	11	76
百分比		74.5%										
重出 主要 作家	许相卿		13			3	2	3		4		25
	骆问礼		3							2	2	7
	吴国伦	5										5
	田艺蘅										5	5
重出 类书	《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	4								3		7
	《新镌时用通式翰墨全书》	1	4									5

* 此表仅列出三十卷本中重出文章数≥5篇的主要作家

百分比:重出作品数/三十卷本新增文章总数(102篇)

值得关注的是,在三十卷本重出的作品中,有一成可在当时通行的两部类书中找到相同的文本。《贺谢君希建楼启》《贺吴吏部建百花庵启》《贺罗翰撰归省启》《谢李郡伯建三元坊启》4篇启和《祭彭文宪公文》《祭李文忠公

①何焯:《义门先生集》卷十《两浙训士条约》,《续修四库全书》第1420册,第240页。
②吴国伦:《甌甌洞稿》卷五四,《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793册,第1135、1137、1140页。
③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一,《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536册,第566-567页。

文》《祭兵部尚书蛟峰方公文》3篇祭文,见于元代前期刘应李所辑《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祭文实为欧阳修《祭杜祁公文》、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王十朋《祭张魏公文》^①。另一部类书为晚明王宇所辑《新镌时用通式翰墨全书》,《候邑侯洪玉岗启》和《候郡伯龙公》《寄礼部蛟峰方公》《与御史唐公》《候吏部尚书陆公》4篇书简均见于该书“宦交类”,依次题作《奉知县贤侯父母大人》《奉知府方伯太守公祖大人》《奉礼部尚书春官大宗伯大人》《奉御史绣衣执法大人》《奉吏部尚书天官冢宰相君大人》^②。作为应酬交际文书的资料汇编,类书为日常的应用文体写作提供了检索备查的模板。有别于简单的事实类罗列和书仪活套示范,这两部类书中都完整保留了大量前人的翰墨原作,并且多数作品下都注有作者。考虑到各式类书在选例取材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相互借鉴、因袭前作的情形^③,三十卷本在当时直接参照的是否即为这两部类书,其实尚不能作出确论。但不难想见,这类对前人启札通篇收录的应用写作专用类书,为三十卷本编者这样意图窃取他作、以假混真的造伪之人带来了意外的便利,只需巧易名目、略作删改,作品原有的署名依据便泯然无迹了。

从对篇名的改动来看,三十卷本似乎是在保留原有的职官称谓之余,随意附加姓氏或攀牵称谓。但事实上,如果观察比对的视野不局限于一对一的原作与重出作,而是扩大到不同文体下的各篇文章,乃至早期版本中已有的作品,便会浮现出更多有迹可循的作伪“规律”。这些潜在的细节进一步展现了三十卷本在编纂成书时,编者是如何利用手头已有的文献资源对篇目进行篡改,同时试图维系集内题名面貌的自洽统一;又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疏忽失察,不慎造成人物时代错位、文章内容互悖、史实常理不符等诸多纰漏,从而露出了作伪的马脚。

首先,三十卷本的编者有意选取了与商辂的政治身份相对吻合的文章进行篇名改换。如上文提到的《谢李郡伯建三元坊启》,类书中本题为《谢临

①刘应李辑:《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后丁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221册,第6、8页;庚集卷二一,第1220册,第183页;甲集卷四,第1219册,第401-402页;戊集卷四,第1219册,第671-672页。

②王宇纂辑,陈瑞锡释著:《新镌时用通式翰墨全书》卷十一,和刻本,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叶十一、叶九、叶一至二、叶五、叶一。该书目前仅存宽永二十年(1643)和刻本,集前附王宇所撰序文,序系于明天启六年(1626)。

③如《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与《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内容多有相同,所收诗文也有与《古今事文类聚》连续相同者。见仝建平:《〈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4、191-192页。

江李总管重建状元坊启》，系名于南宋黎立武。考之《严州府志》，正统至成化间也并无李姓郡守^①。篇名改易之后，鉴于商辂“终明之世，三试第一者，辂一人而已”^②的特殊身份，仅从篇名其实很难对文章的真伪萌生怀疑。再如上文提到的将《祭杜祁公文》改题为《祭彭文宪公文》，彭时（1416-1475）与商辂皆以科名致位宰辅，后世常将二人并举，卒年稍晚于彭时的商辂为其撰写祭文倒也合乎情理。三十卷本删去了原文中提及作者“欧阳修”和时间“嘉祐二年三月”的小引，加之杜衍和彭时均曾拜相，若时人不熟悉欧阳修的文集，单看此篇作品也很难察觉其为伪作。

复次，三十卷本对篇名进行改动时，利用了十一卷本和十卷本已有的诗文题目，从中直接摘取称谓。像上文提到的《贺罗翰撰归省启》，在类书中作《送贺官归》，“罗翰撰”之名可在十卷本收录的《送罗翰撰归省》一诗中找到依据。类似的还有书简《与李绣衣督学》，本为许相卿《与朱应周参政》^③，“李绣衣督学”之名见于十一卷本和十卷本的《送李绣衣督学》一诗。当然，挪用“姓氏+职官”这样笼统的称谓是较为稳妥的一种做法，而一旦涉及到挪用更为具体的人物姓名，三十卷本便暴露出作伪时的不慎纰漏。

在前述对两部类书所收作品进行的篇名改易中，“蛟峰方公”之名重复出现。同样的情形还见于《贺方蛟峰升兵部尚书启》，该篇实为吴国伦《贺总戎方公加升兵部尚书启》^④。方逢辰（1221-1291），字君锡，号蛟峰，与商辂同为浙江淳安人。“方蛟峰”之名被三十卷本的编者多次使用，当归因于十一卷本、十卷本在“序”中都收录了《蛟峰方先生文集序》一文。文中商辂自陈“宋蛟峰先生学圣贤之学，期以行圣贤之道”“予生也晚，素勤想慕”，并称自己之所以题写集序，是由于“兹先生裔孙渊膺贡来京，偕其侄兵科给事中辅持先生遗文见示，俾为之序”。三十卷本的编者见已有序文题目中出现过“方蛟峰”之名，不及细读便加以挪用，却未详察方逢辰本为南宋人，与商辂不属同一时代。以其名入题而作书简、贺启和祭文，自是不经之谈。

从已有序文中直接挪用人名，《答陈蒙轩》亦是一例。“陈蒙轩”之名见于十一卷本、十卷本所收《蒙轩先生诗文集序》，序文开篇即称“蒙轩，余姚陈先生惟成别号也”。陈贇（1392-1466），字惟成，号蒙轩，生平与商辂有重合但较之稍早。《答陈蒙轩》中写道“承惠名作，高才逸群”，既然已有商辂为陈

①吕昌期修，唐仲贤等纂：《〔万历〕严州府志》卷九《秩官志》，《中国方志丛书》第567号，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747-748页。

②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七六《商辂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4687页。

③许相卿：《云村先生文集》卷四，第41页。

④吴国伦：《甌甌洞稿》卷五四，第1137页。

蒙轩集所撰的序文,复有此书简则看似合情合理。然而,细察集序,该集是陈蒙轩之子“取遗稿录而藏之者”“欲侵梓以传”,特请商辂为序。序中并无一语提及二人生前有过交游往来,因此陈贄是否曾将作品赠予商辂尚是存疑的问题。况且,序中称“先生诗文和平雅淡,类其为人”,书简中却作“朗吟数章,不觉激烈放情”,对其文风的形容截然相悖、差之千里。其实,这一书简本是冯惟讷为李开先《中麓小令》所作跋语,“激烈放情”正可与李开先在《中麓小令》“引”中自述的“悲忿之音,激烈之辞”相呼应^①。三十卷本以附会题目的方式张冠李戴,却忽视了文章内容的相互契合,作伪之行可见一斑。

至于集中同样多次出现的“王济之”一名,只要略悉人物生平实迹,便能察觉题名中有违常理之谬。王鏊(1450-1524),字济之,成化十年(1474)乡试解元,次年会试会元、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编修,后入阁。《谢王济之太史》《复王济之》原本出自屠隆《与王百谷》^②和骆问礼《复王印洲》^③,书简作伪自不待言。三十卷本的编者将王鏊之名系于文章篇题,或许是看中了王鏊在科举仕宦中与商辂较为近似的履历。但事实上,王鏊的生年与仕历均晚于商辂。三十卷本所收《贺济之王公启》中出现“恭惟太师王老先生黄扉硕辅”之语,明显与史实常理不合。若此篇题目未作改动,确系写给王鏊的贺启,则文章断然不会出自商辂之手;若题目并非原貌,而是三十卷本编者擅自改换,则文章也自然是从他处窃取无疑。

总的来说,三十卷本商辂集中补录的多数文章皆为紫色蛙声,实是从明人别集和日用类书中摘取窜易而成。文章的重出折射了编刊造伪活动中更细微、更具体的一重面相:编者通过改易篇名,使伪作看似与作者的真实身份相匹配,并使其在题目上与原有的作品相呼应,从而直观地形成集内篇名的整体统一。作伪的手段虽也算有心,但尚称不得高明。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总会因疏失而产生与事实不符的纰漏,使得作伪之举有迹可循。

四、三十卷本商辂集校者辨伪考

经过对三十卷本新增诗文重出情况的考察,已然可以断定,此集据摭繁猥,珠砾混杂,实是将数人作品打散糅入已有的十卷本中,从而形成看似容量更丰、收录更全的新集。三十卷本卷端编者仍署为刘体元,亦应是沿袭自十卷本而来,真实的编者信息仍须从校者署名中寻找端倪。在同一体裁下,三十卷本基本延续了十卷本各卷原有的校者,但同时出现了三位引人瞩目

^①李开先著,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470页。

^②屠隆:《由拳集》卷十五,《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841册,第2383页。

^③骆问礼:《万一楼集》卷二五,浙江省图书馆藏,叶九。

的新校者,亦是晚明并负宿望的出版商——韩敬、茅维和臧懋循。前论已然指出,三十卷本在编纂时删减了他人诗文中涉及原作者身份经历及所处时代的副文本信息,作品的重出造伪应是刻意为之,绝非无心之失。由于三十卷本集前缺乏可以佐证编者信息或编刊过程的新增刻序,接下来将要直面的问题便是校者署名的真伪:到底是韩敬、茅维、臧懋循三人确实参与了三十卷本的编校,却无视出版质量而故意窜易他人之作;还是另有书商妄托三人梓集之盛名而在版刻中伪作校者,匆促成书以图射利?

首先,必须予以承认的是,在已有可以确认编刊者身份的晚明刻本中,包括茅维、臧懋循在内的湖州出版望族确曾以商业获利为目的而梓行前贤著述,也曾通过牵傍名人等手段来争取广销多售,出版的书籍并非均是校讎精良之作^①。故时人有论:“大凡书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盖不能捐重价故耳。近来吴兴、金陵駸駸蹈此病矣。”^②四库馆臣批评臧懋循所编《诗所》“不能有所考订,而掇拾钉,以博相夸;又不分真伪,裨贩杂书以增之”^③;王鸣盛指摘韩敬评点的《李德裕会昌一品集》“乃俗本,多讹脱”^④;包括韩敬校订的刘辰翁评《班马异同》一书,也被指出有3条新增评语误收他作,并非出自刘辰翁本人^⑤。然而,此类编刊情形与三十卷本呈现出的相近面相,依然不能作为校者即韩敬、茅维、臧懋循三人的有力说明。毕竟,在晚明蓬勃发展的刻书业中,因商业逐利而造成的编刻陋劣粗疏、成书繁芜草率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伪托当世名家校正,又是坊间书贾藉以扩大图书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促进销售的惯用伎俩^⑥。因此,对于三十卷本校者中所署的韩敬、茅维、臧懋循之名,尤有细辨分明之必要。

三十卷本中,卷一“赋”、卷十二“七绝”等校者署为韩敬。由于其名出现

①赵红娟:《晚明望族编刊活动研究——以湖州闵、凌、茅、臧四大望族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72-178页。

②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130册,第608页。

③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下册卷一九三,中华书局,1965年,第1755页。

④王鸣盛撰,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下册卷九一《李德裕议杀郭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356页。王鸣盛书中误作“韩敬刻”,该集实为韩敬评点、茅兆河审定、茅元禎刊刻。韩敬《李文饶集序》:“《会昌集》向无善本,余偶抄录,手为评隲。亡友茅巨源爱而欲刻之,未竟斯志。尊人师山先生好古特甚,遂寿诸梓。”(李德裕撰,韩敬评点:《李文饶文集》韩序,明天启四年(1624)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叶七至八)

⑤倪思撰,刘辰翁评:《班马异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藏。其中评语误收《百大家评注〈史记〉》的情况,详参王晓鸥:《〈班马异同评〉刘辰翁三条评语考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第41-46页。

⑥何朝晖:《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78页。

在首卷卷端,不少著录丛书中将三十卷本径注为“万历间西吴韩敬刻本”^①。事实上,如此题署存有潜在的风险。相关集序的缺失使韩敬是否确实参与了三十卷本的校正与刊刻都成为存疑的问题,如果将视线投诸韩敬从事过的其它出版活动,将三十卷本商辂集置于韩敬编刊过的其它书目文献,这一存疑则更为凸显。在目前可察的几种韩敬编刊的著述中,无论是评点、编纂、校订还是刊刻,基本均留有韩敬所撰序文。前文提及的韩敬评点《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及校订《班马异同》两部著作,集前分别有所撰《李文饶集序》和《班马异同序》。此外,韩敬编纂刊刻的汤显祖《玉茗堂全集》^②和重新校订的王守仁《阳明先生集抄》^③,亦附有《玉茗堂全集序》和《湘洲先生批选王文成内外集序》。上述4篇序文均为手书的行楷书体,其中3篇序后还有“韩敬之印”与“韩氏”两方钤印。从保留序文的书法审美这一点可以看出,韩敬在撰序时顾及了内容与形式的兼美,集序的撰写显然是其在编刊过程中比较重视的一个环节。若果如是,在编校和刊刻三十卷本商辂集时,无论是出于商辂本人三元及第的特殊身份,还是出于三十卷本作为“全集”首次面世的重要意义,按理都不应缺少韩敬的序文。因而将韩敬作为三十卷本的校者甚至是刻者,实难举出令人信服的佐证。

三十卷本中,卷二“乐府”、卷八“七律”、卷十“七排”、卷十三“词”、卷十七“启”、卷二十九“祭文”等校者署名为茅维。前论已经提到,三十卷本所收14首词中,9首为苏轼词,另有4首为谢榛的七古。然而,茅维本就在明代词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不仅别集《十赉堂集》乙集和丙集中词部单独成卷,存词近百首;更曾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编刊《东坡先生全集》,即苏轼文集与词集之合本^④。在《与陈眉公书》中,茅维自称刊刻是集“资费千金而羨,三年之功,略可底成”^⑤。因此难以想见,在编刊过程中耗费了大量心血、资金和时间的茅维会将亲自辑佚校订过的苏词故意删去题下小序置入商辂集中;也同样难以想见,深谙填词之法的茅维会将与词律毫不相干的七古纳入词部。

①如《中国古籍总目·集部》第2册,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85页;方建新、徐永明、童正伦编:《浙江文献要目》,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34页。

②汤显祖撰,韩敬辑:《玉茗堂全集》,《明别集丛刊》第四辑第26册。

③王守仁撰,李腾芳编,韩敬重校:《阳明先生集抄》,明崇祯刻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④有关茅维编刻苏轼作品的情况,详参赵红娟:《晚明望族编刊活动研究——以湖州闵、凌、茅、臧四大望族为中心》,第323-326页。

⑤茅维:《十赉堂甲集》卷十一,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吴兴茅氏刻本,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藏,叶二十五。

故而校者署为茅维恐非实情。

三十卷本中,卷五“七古”、卷十一“五绝”、卷十八“书简”等校者署名为臧懋循。前表中已示,五绝中有13首重出俞安期集。但事实上,臧懋循与俞安期曾有过直接的交游活动。俞安期集中不少诗作都提到与臧懋循的日常往来^①,言及自己“闻君示病”而问疾过访;臧懋循集中亦存为俞安期所作的送别诗^②,足证二人关系匪浅。更遑论臧懋循与俞安期曾在杭州、金陵一带频繁参与雅集结社活动,为诗社集会所赋诗作更是累见不鲜。万历二十八年(1600),俞安期“约诸公结社西湖”^③,在坐者即有臧懋循;万历三十三年(1605),曹学佺招集诸人在清凉台登高后宴集,作为并属金陵诗社的主要成员,俞安期、臧懋循同列席中^④。俞安期年逾七秩,卒年晚至天启七年(1627)后^⑤,而臧懋循的谢世则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就情理而言,作为与俞安期相识相交的好友,臧懋循在俞安期仍在世时便将其诗作故意窜易充入商辂集中,此种情况的出现实在难以解释。因此,校者署为臧懋循同样令人怀疑。

综上所述,三十卷本商辂集中题署韩敬、茅维、臧懋循为校者,多有与事实情理不合之处,三人故意造伪、窜易他作的可能性并不大。考虑到三十卷本的刊刻当在张居正集首刻的万历四十年(1612)之后,而在此之前,韩敬已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登科状元。由当世状元编刊前朝状元世所未见的“全集”,这一“状元效应”的噱头自然博人眼球。不难想见,书商借此托名造伪进而从中射利,或许更符合三十卷本的结集背景。更何况在明代中后期,瞄准科考制艺这一市场商机而刊刻经义性理、程文墨式、应试技巧、名家文集等各类相关用书的出版行为迭兴而起,商辂作为连中三元的一代名臣,又曾“一主考会试、五为廷试读卷官”^⑥,笔下所出的应用文章无疑倍受学子推崇,这一点从三十卷本中新增策、启、书简等内容也可窥一斑。不过,在当时收录商辂作品的出版物中,业已出现编纂取次驳杂的情形。张鼎在万历后

①俞安期:《蓼蓼集》卷二十《同臧博士、王明府、齐王孙集》、卷二三《寄臧晋叔》、卷二九《九月八日同陶懋中、臧晋叔、宋忠父集》、卷三九《访臧晋叔》,第178、205、270、372页。

②臧懋循:《负苞堂诗选》卷二《送俞公临同吴明卿参政溯汉江随访李本宁太史》,《明别集丛刊》第四辑第29册,第399页。

③冯梦祯:《快雪堂集》卷五八“万历庚子八月初四日”条,《明别集丛刊》第四辑第19册,第183页。

④谢肇淛:《小草斋集》卷十六《乙巳九日清凉台征会登高》,《续修四库全书》第1367册,第58页。

⑤何朝晖:《山人与出版:俞安期生平、著述与刻书活动考》,第372页。

⑥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五五,第514页。

期“辑商文毅公而下至许同安所为应制文若干首”,但之后乡里刊刻时却“杂乱纍纍,烦而寡要,博而无伦”,以至张鼎诟病“贾人何知,向利为德”^①。足见当时坊间书商一味蝇营射利而枉顾出版质量的行径。在此背景下,三十卷本商辂集打着“全集”的旗号凭空出世,在迎合市场对科考制艺类书籍的需求之余,趁机大肆窜易他作充入集中以图获利,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余论

作为一部首次以“全集”面貌问世而实为书商托名校刻的文集,三十卷本之于商辂研究的文献价值已然不足为据。但其将数人作品刻意打散糅入一人集中、对文集作者与编者同时双重托名的作伪行径,却不妨成为“印本时代”伪书制造与生成、作伪套路之应用的独特缩影。相较于在诗选中以当代数人作品冒充前代一人之作^②,在别集中以当代数人作品冒充当世一人之作,则是更为别样的一重作伪面相。在文集流传与作品接受都尚未得到充分的时间积淀的情况下,同时代人作品之间的相互窜易无疑有碍于作者本人准确的文学史定位,也使当代文学史的真实面貌更为驳杂难辨。同时,伪作带来的虚假构建终会导向意义的必然消解,一旦作伪之迹被察觉,对作品系名的质疑自然会为作者及文本的后世接受带来隔阂。

不宁唯是,将数人作品刻意打散糅入一人集中而形成作品在不同作家名下的流窜,也为考察“印本时代”文本的不稳定性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传统观念下,与“印本时代”随之而来的是文本的相对稳定,像刊刻环节因刻工不慎疏漏而造成的文字错讹、校订环节因作者二次修改而产生的词句异文,此类表现于文本内部的小范围异变其实并不影响作品之于作者本人的文学意义。然而,像三十卷本这样在编纂环节通篇窜易他作,则构成了以作品整体为单元的另一形态的文本不稳定。这种因编者刻意作伪而带来的文本流动,在另一层维度为理解文本的稳定与异变补上了注脚。由是观之,对于“印本时代”参差复杂的编刊状况及浮现的种种作伪情形,仍须付以更精微的审视和考量。

【作者简介】宋佳霖,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代文学与文献。

①张鼎:《宝日堂初集》卷十一《元雅序》,《明别集丛刊》第五辑第22册,第591页。

②如明人胡震亨《唐音统签》所录唐人殷尧藩的87首诗中,16首为明人史谨之作,3首为明人吴宗伯之作。详参陶敏:《〈全唐诗·殷尧藩集〉考辨》,《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第30-34页。